

三國集

(註釋本)

魯迅



三 閑 集

魯 迅

今代圖書公司出版

三 閒 集

魯 迅 著

*

今代圖書公司出版
香港電氣道一三五號十二樓

嶺南印刷公司承印
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

*

香港·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

1965年5月版

[No. 3953]

定價 H.K. \$ [REDACTED]

精裝本

出版說明

本書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作者亲自編校的初版，并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時的雜志和報紙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時，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後面，在正文中則標以1、2、3……的號碼。

本書最初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，此後印行的版本都和初版相同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編入第四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時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，懇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目 录

序言	1
一九二七年	
無声的中国	7
怎么写(夜記之一)	13
在鐘樓上(夜記之二)	21
辞顧頡剛教授令“候审”(并来信)	30
匪笔三篇	32
某笔两篇	37
述香港恭祝聖誕	40
吊与賀	44
一九二八年	
“醉眼”中的朦朧	49
看司徒乔君的画	55
在上海的魯迅啓事	57
文艺与革命(并冬芬来信)	59
局	67
路	68
吳	70

通信(并Y的来信).....	72
太平歌诀.....	80
剧共大观.....	82
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.....	84
革命咖啡店.....	90
文壇的掌故(并徐匀来信).....	92
文学的阶级性(并愷夏来信).....	96

一九二九年

“革命軍馬前卒”和“落伍者”	101
《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》小引	102
現今的新文学的概觀	104
“皇汉医学”	109
《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頁》	111
叶永蓁作《小小十年》小引	113
柔石作《二月》小引	116
《小彼得》譯本序	118
流氓的变迁	121
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	123
書籍和財色	124
我和《語絲》的始終	126
魯迅譯著書目	135
注釋	145

序　　言

我的第四本杂感《而已集》的出版，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。去年春天，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后的杂感。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，創作和翻譯，或大題目的長論文，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，但短短的批評，縱意而談，就是所謂“杂感”者，却確乎很少見。我一时也說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。

但粗粗一想，恐怕这“杂感”两个字，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，避之惟恐不远了。有些人們，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，就往往稱我為“杂感家”，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，便是一個証據。還有，我想，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，寫過這一类文字，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，再提恐或玷其令名，或者別有深心，揭穿反有妨于战斗，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。

“杂感”之于我，有些人固然看作“死症”，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，但編集是还想編集的。只因為翻閱刊物，剪帖成書，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，因此拖延了大半年，終于沒有動過手。一月二十八日之夜，上海打起仗來了，越打越凶，終于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，¹ 書報留在火線下，一任它燒得精光，我也可以靠這“火的洗礼”之靈，洗

掉了“不滿于現狀”的“杂感家”這一個惡謠。² 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，書報却絲毫也沒有損，于是就東翻西覓，開手編輯起來了，好像大病新愈的人，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，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。

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，篇數少得很，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，³ 原就沒有記錄外，別的也彷彿並無散失。我記得起來了，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，沒處投稿的時期。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，⁴ 留開廣東的，那些吞吞吐吐，沒有胆子直說的話，都載在《而已集》里。但我到了上海，却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，創造社，⁵ 太陽社，⁶ “正人君子”們的新月社⁷ 中人，都說我不好，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，那時的文字里，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，以表示他們的高明。我當初還不過是“有閑即是有錢”⁸，“封建余孽”或“沒落者”，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⁹了。這時候，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，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麿君，¹⁰ 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：“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，不和我來往了，說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處。”

那時候，我是成了“这样的人”的。自己編着的《語絲》，實乃無權，不單是有所顧忌（詳見卷末《我和語絲的始終》），至于別處，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“擠”才有的，而目下正在“剿”，我投進去干什么呢。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。

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

約，都收納在这一本里。至于对手的文字呢，《魯迅論》和《中國文艺論戰》¹¹中虽然也有一些，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礼堂上的陽面的大文，并不足以窺見全体，我想另外搜集也是“杂感”一流的作品，編成一本，謂之《圍剿集》。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，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，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，即陰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門。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傳，去年的“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”說，就是老譜里面的一着。¹²自問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，仿照固然可以不必，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。

其实呢，我自己省察，無論在小說中，在短評中，并無主張将青年來“杀，杀，杀”¹³的痕迹，也沒有怀着这样的心思。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論的，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，青年必胜于老人，对于青年，我敬重之不暇，往往給我十刀，我只还他一箭。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錯了。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蠱惑我的，我在广东，就目睹了同是青年，而分成两大阵营，或則投書告密，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实！我的思路因此轟毀，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，不再無条件的敬畏了。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呐喊几声，不过也沒有什么大帮助。

这集子里所有的，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，只有書籍的序引，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話可供参考之作，选录了几篇。当翻檢書報时，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沒有編在《而已集》里的东西，也忽然發見了一点，我想，大約《夜記》是因为原想另成一書，講演和通信是因为淺薄或不关紧要，所以

那时不收在内的。

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，作为《而已集》的补遗了。我另有了一样想头，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，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。我去讲演，一共两回，第一天是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¹⁴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，第二天便是这《无声的中国》，粗浅平庸到这地步，而竟至于惊为“邪说”，禁止在报上登载的。是这样的香港。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。

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，是他们“挤”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，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，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。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《艺术论》¹⁵，以救正我——还因我而及于别人——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。但是，我将编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时所集的材料，印为《小说旧闻钞》，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，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，指为“有闲”，而且“有闲”还至于有三个，¹⁶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。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这样锻炼周纳法的，他们没有学过“刀笔”。编成而名之曰《三闲集》，尙以射仿吾也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，编讫并记。

一九二七年

無声的中国¹

——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講——

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無聊的講演，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，竟还有这許多来听的諸君，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謝。

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：《無声的中国》。

現在，浙江，陝西，都在打仗，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，我們不知道。² 香港似乎很太平，住在这里的中国人，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，別人也不知道。

發表自己的思想，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，然而拿文章來达意，現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。这也怪不得我們；因为那文字，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产。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，还是难于运用。因为难，許多人便不理它了，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張还是章，或者簡直不会写，或者說道：Chang。虽然能說話，而只有几个人听到，远处的人們便不知道，結果也等于無声。又因为难，有些人便当作寶貝，像玩把戏似的，之乎者也，只有几个人懂，——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，而大多数的人們却不懂得，結果也等于無声。

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別，其一，是文明人有文字，能够把他們的思想，感情，借此傳給大众，傳給将来。中国虽然有文字，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，用的是难懂的古文，講的是陈旧的古意思，所有的声音，都是过去的，都就是只等于零的。所以，大家不能互相了解，正像一大盘散沙。

将文章当作古董，以不能使人認識，使人懂得为好，也許是有趣的事罢。但是，結果怎样呢？是我們已經不能将我們想說的話說出来。我們受了損害，受了侮辱，总是不能說出些应說的話。拿最近的事情來說，如中日战争，“拳匪”事件，民元革命³这些大事件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？民国以来，也还是誰也不作声。反而在外国，倒常有說起中国的，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，是別人的声音。

这不能說話的毛病，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；他們还比較地能够說些要說的話。待到滿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，講历史的，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，講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。⁴ 所以，到乾隆年間，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。所謂讀書人，便只好躲起来讀經，校刊古書，做些古时的文章，和当时毫無关系的文章。有些新意，也还是不行的；不是学韓，便是学苏。韓愈苏轼他們，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当时要說的話，那当然可以的。我們却并非唐宋时人，怎么做和我們毫無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。即使做得像，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，韓

愈苏轼的声音，而不是我們現代的声音。然而直到現在，中国人却还要着这样的旧戏法。人是有的，沒有声音，寂寞得很。—— 会沒有声音的么？沒有，可以說：是死了。倘要說得客气一点，那就是：已經啞了。

要恢复这多年無声的中国，是不容易的，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：“你活过来！”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，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現一个宗教上之所謂“奇迹”一样。

首先来嘗試这工作的是“五四运动”前一年，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“文学革命”。⁵ “革命”这两个字，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，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。但这和文学两字連起来的“革命”，却沒有法国革命的“革命”那么可怕，不过是革新，改換一个字，就很平和了，我們就称为“文学革新”罢，中国文字上，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。那大意也并不可怕，不过說：我們不必再去費尽心机，学說古代的死人的話，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；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，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。然而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，因为腐敗思想，能用古文做，也能用白話做。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。思想革新的結果，是發生社会革新运动。这运动一發生，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动，于是便釀成战斗……。

但是，在中国，剛剛提起文学革新，就有反动了。不过白話文却漸漸風行起来，不大受阻碍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因为当时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汉字，用羅馬字母来替代。⁶ 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，很平常的，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，就大不得了了，于是便放过了

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，而竭力來罵錢玄同。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，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，反而沒有阻碍，能夠流行了。

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，折中的。譬如你說，這屋子太暗，須在這裡開一個窗，大家一定不允許的。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，他們就會來調和，願意開窗了。沒有更激烈的主張，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。那時白話文之所以通行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。

其實，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，本該早已過去了，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，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。例如，有的說：古文各省人都能懂，白話就各處不同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。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，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；至于古文，何嘗各省人都能懂，便是一省里，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。有的說：如果都用白話文，人們便不能看古書，中國的文化就灭亡了。其實呢，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，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，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，用不着那麼心驚膽戰。他們又有人說，外國尚且譯中國書，足見其好，我們自己倒不看么？殊不知埃及的古書，外國人也譯，非洲黑人的神話，外國人也譯，他們別有用意，即使譯出，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。

近來還有一種說法，是思想革新緊要，文字改革倒在其次，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，可以少

招一重反对。这话似乎也有理。然而我们知道，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，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。

因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，說着大家不明白，不听见的話，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，痛痒不相关了。我們要活过来，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。时代不同，情形也两样，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，孔子口調的“香港論”是無从做起的，“吁嗟闊哉香港也”，不过是笑話。

我們要說現代的，自己的話；用活着的白話，将自己的思想，感情直白地說出来。但是，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。他們說白話文卑鄙，沒有价值；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，貽笑大方。我們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，其余的都只能說白話，难道这許多中国人，就都是卑鄙，沒有价值的么？至于幼稚，尤其沒有什么可羞，正如孩子对于老人，毫沒有什么可羞一样。幼稚是会生长，会成熟的，只要不要衰老，腐敗，就好。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动手，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。她的孩子学走路，即使跌倒了，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，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。

青年們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。大胆地說話，勇敢地进行，忘掉了一切利害，推开了古人，将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来。——真，自然是不容易的。譬如态度，就不容易真，講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，因为我对朋友，孩子說話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。——但总可以說